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农村的历史变迁 国风著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5

ISBN 7-5017-0411-1

I. 中... II. 国... III. 农村 社会变迁 研究 中国
IV. ①F12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2345 号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责任编辑：王东萍
责任校对：王肖楠
技术编辑：李长建
封面题字：王定成
整体设计：蒋宏工作室

中国农村的历史变迁

国风摇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 9 号 邮编：100048

第三编辑中心电话：010-68554315 发行部电话：010-68554315

网址：www.jkpp.com.cn

电子邮件：jkpp@jckp.com

北京密兴印刷厂印装

开印 2005 年 1 月 1 日 印张 12 页 字数 200 千字

2005 年 1 月第一版 2005 年 1 月第二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ISBN 7-5017-0411-1 定价：25.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摇翻印必究)

序：“农耕”与中华文明

在时下的语境中，一谈到“三农”，大多数人会想到“三农问题”，甚至还会想到“滞后”、“现代化障碍”等等。其缘由不外乎两点：浸淫于现代化带来的幸福生活中的人们正自觉不自觉地渐渐淡忘了现代文明的源头——农业文明，而现代我国农村的贫苦和落后，又使得温馨的乡村只在古诗中才能觅得，“贫困”、“落后”几个孤独的名词就成了人们对“农”的主要印象；建国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在农村开始进行大规模的反贫困行动，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在冲击着国人眼球，甚至生活。

我亦如此，在刚听说国风有关于“三农”新作时，充盈和盘桓在我脑际的就是“三农问题”，为此，我在拜读前做好了“苦读”的心理准备。出乎意料，整个阅读的过程是想象不到的轻松愉快，我几乎是以废寝忘食的方式读完。整个书稿给我的不仅仅是视角的冲击，更重要的则是内心的强烈震撼。作者高屋建瓴，从中国农业的起源、古代聚落的形成、国家的出现、伦理道德的逐步规范化等文化的全新视角，引经据典给我们诠释了“三农”与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内在联系。透过字里行间，我似乎看到了我们的先祖从遥远的上古时代起，为了中华民族的进步而奋斗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国风治学谨严，勤于思考，数十载耕耘不止，每著独辟蹊径，必有独到见地，往往给读者以惊喜。《中国农民的传统生活》、《中国农业的历史源流》和《中国农村的历史变迁》三部力作是他多年广涉中外史书，研究史料之心血。其突出特点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科学地运用现有的考古实物和文献资料，将历史与现实辩证地结合在一起，从农村、农民、农业三位一体的视角，清晰地再现了自上古时代起，我们的先祖们为了追求幸福生活所做的艰辛劳作和取得巨大成就的恢弘历史，揭示了“三农”与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的渊源关系

通常我们所看到研究中国文明史的论著，或以通史或以专门史的方式展开。而研究“三农”者大多带有明显的专题性。从农村、农民、农业三位一体的视角，把远古的“三农”和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结合在一起而进行研究的论著仍属鲜见。从这个意义上说，国风新著的命题就已经是一种创新。而在书中，这样的创新亦随处可见。作者在论证文明的起源时说：“新石器时代晚期社会又发生大转折。对外，农庄聚落间的交往越频繁，战争越剧烈，集团意识更加强；同时由于战争掠夺，内部贫富的差距也益大，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分野益明。军队、政府于是产生，这就是国家。他们在聚落周围圈起城墙，保护自己，抗御敌人，考古学家把这种转变称为‘城市革命’。人类文明史上‘城市革命’的意义或不及‘新石器革命’之深远，但也不失为一个极重要的转折点，不比工业革命逊色。而今后人类才有典章制度、文字艺术。”据此，得出结论：“历史文明肇端于此，荫庇后世无穷，我们今日尤承受其遗泽。”作者在论证“三农”对现代文明的巨大影响和先祖对后人启迪时，作者

得出这样的结论：“新石器时代的祖先分别在我国土地上开天辟地，创造文明。他们先聚集为村落，然后又聚集成国家。物质文明虽然精进，但食稻粟，住木土，发端于数千年前，而成为中国文明的基本特征。另一方面远古农庄聚落阶段的‘均’于‘公’，从现实升为理念，启发两千年后的（老子）和‘礼运’。源田多年后也启发了中国近代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它变成中国文化不竭之源泉，人类文明永恒的瑰宝。中外历史也显示人类不断地朝着‘均’与‘公’的道路上迈进。”回首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历史，不正是这样吗？

著述始终以考古实物和历史文献资料为依据，将历史与现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严谨论述方式，使这一创新更趋完善。据我的粗略统计，在论述中因为考据的需要，三部著述中，仅提到的历史人物就逾百位，引用的史籍过百部。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史籍中，把所需要的历史资料整理出来并科学地运用，实非易事。阅读梳理之繁重，是可想而知的。没有几十年耕耘的基础，的确无法想象。国风所著真正做到方家所云的“论从史出”。

第二，从中西文化的交流入手，通过大量的历史事实，阐释了人类历史的持续进步，离不开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这一基本思想，使其诸多具有创新意义的观点逐步趋于系统

“三农”从诸多方面对中西方文化的相互影响再次作了阐释。以佛教为例，佛教的传人对中国丧礼形成的影响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以后，对中国民间丧礼传统的影响和儒、佛、道三教思想的融合起了特殊的作用。在佛教传入前，中国已经有了相对完备的、仪式繁杂的丧礼。其特点是，“‘灵魂不死’的观

念，一直阴魂不散地缠绕在中国的丧礼中”，但“‘灵魂不死’的观念在死后的信仰中是不完善的，对灵魂的去处，并未形成合理的宗教逻辑”。因此，“未来的佛教，却带来一套新的死后世界观——六道轮回，转世托生。”此后，虽然佛教有灵魂的理论曾经遭到儒家知识分子的抗诘，甚至在梁武帝时发生了著名的儒佛论战。但“相当于儒家《孝经》的佛教经典《反母恩重经典》，显示了佛教与儒家在孝亲观念上的协调”。“佛教进入中国时，也还带来了佛教特有的丧礼仪式。”而“最能代表佛家仪式的便是丧礼中的（七七斋）”。作者得出结论是：“丧乱仪式的三教融混，与死后信仰的三教归一，是同时并进的，而且愈来愈普及，普及的过程是由社会下层渐及上层。”这些观点，使作者在不同论著中提出的比较零散而具有创新意义观点逐渐趋于系统。

第三，作者由古而今、从宏观到微观、集学术性与通俗性于一体、“述”必有据、“作”而新颖、汲取前人的研究成果而又不拘泥于成说的思辨和表述方式，不仅使其新著给读者以深刻的哲学启迪，同时也具备了明显的可读性

国风的三部新作，采用的是分小题独立成篇的体例，每个小题之间没有紧密的逻辑联系。但这并不妨碍作者由古而今、从宏观到微观、集学术性与通俗性于一体、“述”必有据、“作”而新颖、汲取前人的研究成果而又不拘泥于成说的思辨和表述方式的一致性。应该承认，作者集学术性与通俗性于一体的表述方式是一大特点。说学术性强，是因为他在阐述每个议题的时候，都会引用代表不同时期，反映不同观点的重要史籍相互印证，极其严谨。从而能够做到对某一事件、制度、节庆的起

源与演变的历史脉络交代的十分清晰。说通俗，是因为作者并不是照搬古人，而是把那些对一般读者来说比较隐晦难懂的话变成今人容易理解的生动活泼语言表达出来。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引用大量的历史资料，并非是述而不作。相反，论著中有诸多作者自己极富创新的观点。比如，在《中国农村的历史变迁》中他提出：“我国早期农业文明大体是利用自然的结果，而非征服自然。”“生产工具虽然没有大改进，社会、文化也会发生大变革……”可见社会转型和文化缔造，因素非常复杂，不能单纯归之于生产工具。”再比如，在《中国农业的历史源流》中，他提出：“再进一步看，任何新开拓的疆土，也只有在农业生根之后，中国文化才可能在其上成长茁壮。……因此，农业疆域的扩展实际也就是中国文化的扩展。”诸如此类的新观点还有很多。这些观点不仅符合历史，在当今中国也有一定现实意义。比如，作者所说的“我国早期农业文明大体是利用自然的结果，而非征服自然。”我认为，这一观点和我们今天所提倡的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精神是一致的。如果像以往一样，把登上一座山峰，截住一条河流、建成一坐水电站，看成是“征服”了山河的英雄壮举而加以炫耀，不仅幼稚而且把人置于自然之外，有悖自然规律。

给广大读者推荐国风三部新著的原因，是因为在我通读书稿时给予我的重要启迪和精神享受！

是为序。

魏晓东谨识

丙戌年端午节于万寿寺甲源号

目 录

- 1 从村落到国家 1
- 2 新石器时代 4
- 3 史前先民的居址 6
- 4 古代聚落的内部结构 9
- 5 不同地区建筑的差异 11
- 6 建筑的进步 13
- 7 食粮 16
- 8 依靠农业的开始 18
- 9 稻米的种植 21
- 10 家畜的饲养 24
- 11 生产工具的改进 26
- 12 从“仰韶”到“龙山” 28
- 13 贫富差别与社会变迁 31
- 14 国家的出现 33
- 15 黄帝的时代 36
- 16 城市革命 39
- 17 原始社会的消逝 42
- 18 从小康到大同 44
- 19 姓氏与族群 47
- 20 姓的衍化——氏 49
- 21 姓氏的标识 51
- 22 五服：“五属之亲” 52

23	传统户口统计与家庭结构	55
24	汉型家庭	57
25	汉代家庭结构	60
26	唐型家庭	62
27	“汉型”与“唐型”的折中	65
28	家族的本质	68
29	世家大族出现以前的社会	70
30	士人与士族	72
31	两汉察举与阀阅的见重	74
32	九品中正制度下的魏晋门第	76
33	阀阅：新的门第	79
34	永嘉之乱以后的世家大族	81
35	东晋的世家大族	84
36	东晋立国与门第	87
37	南方世家大族的衰微	89
38	士族与谱牒之学	91
39	南朝的世家大族	94
40	北方世家大族的处境	96
41	拓跋氏对世家大族的利用	99
42	中古世家大族的剖析	102
43	中国士人中世族的划分	105
44	唐初山东士族的社会地位	107
45	科举的兴起与门第的消融	109
46	中国乡村体制的特点	112
47	秦汉的乡亭里制	114
48	魏晋南北朝之三长制	117
49	隋唐的邻保制	119
50	邻保制的征税职能	121

- 51 宋代的保甲与乡约 123
- 52 王安石与保甲法 125
- 53 宋代的乡约法 127
- 54 元代的社制 129
- 55 明代的乡村组织与里甲制 131
- 56 里甲制的功能 134
- 57 里甲之编的意义 136
- 58 清代的乡村结构 138
- 59 清代的里甲与保甲制 140
- 60 保甲制与里甲制的异同 142
- 61 乡镇作为一级正式政权组织的开始 144
- 62 民国时期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的失败及其原因 146
- 63 乡绅与乡官的形成 149
- 64 父老与三老——地方半自治的中心人物 152
- 65 刘邦“关外父老”与项羽“江东父老” 154
- 66 父老之势力 156
- 67 三老对地方官府的制衡作用 158
- 68 州郡县属吏——地方官府的核心 160
- 69 属吏的来历及辟召 162
- 70 乡举里选理想的破坏 164
- 71 地方自立趋势的兴起 166
- 72 乡里——地方自立的社会基础 168
- 73 属吏的产生与名望之家的形成 171
- 74 九品官人法 173
- 75 名士的出现及作用 175
- 76 乡绅——专制帝国权力的分享者 177
- 77 门阀世家势力瓦解 179
- 78 乡绅势力与投考科举 181
- 79 绅权的危害 183
- 80 乡官与乡绅的演变 185

员 摇摇从村落到国家

摇摇前 人追溯我国历史的起源，不外有两种看法：一是盘古开天地，接着三皇，宋朝罗泌父子的《路史》可作代表；一是以黄帝为断，只讲五帝，不说三皇，汉朝司马迁的《史记》是这派的圭臬。司马迁时代还流传着不少的远古传说与神话，但据他说：“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删除大半，只“择其言尤雅者”着为《史记》的“书首”——“五帝本纪”。

太史公甄别史料不可谓不谨慎，然而近代富有怀疑精神的学者犹以为不足；他们连夏朝都不敢肯定，何况五帝！因此，“黄帝子孙”、“五千年中华史”等传统的基本历史观念发生动摇，而我国文化的根源问题乃陷入荒邈迷蒙之中。

现在重新来检讨这个问题，同样抱着审慎、客观和征实的态度，根据相当科学的资料，我们获得的结论不但和疑古的史家不同，也与太史公有异。大体而论，现阶段我国古史的研究可以上溯到七八千年前，所以太史公还嫌太保守呢！这是数十年来考古家辛勤耕耘的成果，使可信的古史逐渐伸长，然而并不意味我们又返回传统信古的老路上去。

七八千年，只就目前比较详实的资料而言，在此之前，中国土地上当然已有人类生存了。传统信古史家述说历史起源大抵根据西汉的纬书立言，纬书推测天地开辟、人类诞生

颇有异说，大约是猿四万年前。我们知道从有地球到有生命，再到有辨荷谟（匀燥祭荷谟译 旧译智人）的出现，时间差距极远。以猿四万年论天地开辟，有如瞬息；但说有辨荷谟诞生，则未免嫌长，比猿人（粤燥祭荷谟译）还早，北京人距今不过缘四万年而已。古代宗教信仰大概相信有天地不久就有人，我们固不必操今日的科学知识责备古人，事实上，纬书作者比起员五世纪欧洲教会的史家推算上帝于公元前源四源年创造世界是更“科学”、更合理的了。

北京人的发掘是中外考古学界的大事，不但有人类化石，而且发现并存的文化遗物。因此论中国民族、文化的根源有人就祖述北京人。继北京人之后，大陆各地断断续续有古人化石或文化遗存出土，北京人或早，或晚。由于时代太遥远，资料太贫乏，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是不是我们的祖先，目前还不宜论断。其实人类和其他生物一样，都是混杂的，世界上没有纯种的人，我们论一个民族的形成，综合文化单位之“族”应比单纯血缘单位之“种”更值得重视。这里讨论我国文明的萌芽，乃将旧石器文化暂时存而不论，又将体质问题排除（自新石器时代以下，创造中国各地文明的主人大概都属于蒙古种了），只分析文化质素，从村落诞生说起，恐怕是比较谨慎可靠的。

旧石器人类使用极其简陋的打制石器来觅食谋生，数十万年间几乎过着“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的生活，文明进展极其缓慢。晚期进入细石器时代，渔猎生产更活跃，大约到一万年前，人类普遍地经历一次文明的大变革。以新石器为工具，开始农业生产，出现农庄聚落，考古学家称之为“新石器革命”（燥祭荷谟译 燥祭荷谟译）。没有它，人类社会依然停留在不出猿人的游群阶段，依然以渔猎采集为生产手段，食粮来源不稳定，单位面积所能养活的人口也很少。人圆

类社会受到生产手段的约束，长期停滞不进。唯人类一旦农业生产以后，局面就改观了，粮食可以掌握，不必终年累月栖栖皇皇谋果其腹，又时时担心饥饿。人类于是有余裕从事其他的文化活动，社群乃扩大，而且越于复杂，国家、城市才可能诞生。人类昏昏闷闷地过了数十百万年，而在最近这一万年内文明突飞猛进，厥功当首推“新石器革命”。没有它，人之去于禽兽真几希矣。

圆 摇摇新石器时代

摇摇直到今日，我国尚未发现新石器时代最早期的遗址，以解答先民采取农业生产的奥秘。河南新郑裴李岗与河北邯郸磁山发现新石器文化遗址，比西安半坡早上千年，大约公元前 25000 年左右，是目前已知的新石器最早遗址。虽然文化层散布范围较狭小，堆积较浅薄，具备早期聚落的特征，但遗址有房基、窖坑、陶窖和墓地，遗物有农业生产工具、粟及家畜骨骼，已经是典型的农村了。中国农村文明的起点还要靠更早的遗址才能说明，现在尚无法讨论。

三十年来我国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遍布各地，已超过六七千处，发掘者也在百处以上，其中有些是典型的遗址或墓地，对于夏代以前大约三四千年之间的先民历史，可以粗略地纪年。根据文化类型，分成四区，其年代略有参差。仰韶文化前驱裴李岗和磁山文化约居公元前五六千年之间，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从 5000 至 4000 年，4000 至 3000 年是龙山文化，以后即是三代。山东半岛前有大汶口文化，后有典型龙山文化，一脉相承。大汶口文化从公元前 4500 年延续至 3000 年，典型龙山文化起头可能稍早，而在 3000 年左右结束。长江三角洲经太湖流域至杭州湾口有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基本上也是一系的。河姆渡文化约公元前 5000~4000 年，马家浜文化 4000~3000 年，良渚文化值源

以下的 5000 年。汉水与长江中游则有大溪和屈家岭文化稍晚，大溪文化比仰韶文化早期稍晚，屈家岭文化大概在公元前 4500—4000 年之间。

新石器时代晚期社会又发生大转变，对外，农庄聚落间的交往越频繁，战争越剧烈，集团意识更加强；同时由于战争掠夺，内部贫富的差距也愈大，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的分野愈明。军队、政府于是产生，这就是国家。他们在聚落周围圈起城墙，保护自己，抗御敌人，考古学家把这种转变称为“城市革命”。人类文明史上“城市革命”的意义或不及“新石器革命”之深远，但也不失为一个极重要的转折点，不比工业革命逊色。今而后人类才有典章制度、文字艺术。历史文明肇端于此，荫庇后世无穷，我们今日尤承受其遗泽。

猿 摇史前先民的居址

摇摇**中**国史前先民缔造早期农业文明，他们所拥有的只是极其简陋的木石工具和不屈不挠的意志。我国早期农业文明大体是利用自然的结果，而非征服自然，先民选择最有利的环境定居，故其村落遗址多在傍邻小河的台地、丘陵上，并不在大河附近。

该地理特点在七八千年前的裴李岗文化中已非常显著。河南密县莪沟北岗发现典型的裴李岗文化，遗址坐落在双洎河支流绥水与洧水汇合的三角地带，处于群山环抱之中，南距嵩山山脉不过 几余里，周围有大片土地可供农耕。大体上临小河，环山丘，附近又有平坦的地面应是早期农业诞生的摇篮，因为人们取水方便，容易耕垦，又可渔猎采集以补农业生产之不足。我国早期的文明是在这种天人相当和谐的环境里蕴育成长的。考古家探研关中仰韶文化遗址，归纳出三种不同的地理类型：

一是河流两岸的土丘，渭水以南的支流较多。

二是发育较好的马兰阶地，多在渭北黄土原地，高出河床三五十公尺。

三是在距河床较远的泉水附近，泾水沿岸较为典型。

基本特征不外小河、土丘和平坦土地三点。

不仅关中仰韶文化如此，举凡华北新石器时代遗址，西远

起兰州，东至辽东、青岛多不例外。像山西西南地区的仰韶和龙山文化遗址常位于河旁第一二台地上，河南澠池县仰韶村遗址驰名中外，是在土丘上的。而最早发现龙山文化的城子崖濒临武原河，也是河边台地之一，高出平地猿~缘公尺，远望宛如城垣，故乡人称为“城子崖”。山东邹县野店大汶口文化遗址，南靠龙河，东南近峰山，是傍山近水的台地。这种例证不一而足。

江汉淮水流域的地理景观虽与黄河流域不同，但史前遗址所在的位置则无大异，也多在近水的台地和丘冈上。考古家发现的“湖熟文化”遗址相对高度远~苑公尺，绝对高度海拔 苑~ 苑公尺，称为“台形遗址”。它们多沿河流或湖沼岸旁，聚靠山岗，成群散布。其地理环境也可分为三种：

第一种，北临大江，南靠土岗，遗址一面倚近土岗，其余三面是水田。

第二种，两面大山，中间是河流贯穿的山冲，遗址分布在河流两岸接近大山余脉的土岗处，周围多水田、平地或池塘。

第三种，山岗环绕的低洼小盆地，遗址离山岗不远，四周有圩田、小溪或池塘。湖熟文化的年代虽然偏晚，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延续到周初，但其遗址环境的特点是整个新石器时代江、汉、淮水流域的通相。比湖熟文化还早的湖北京山屈家岭，遗址夹在两条小河流间的三角地带，东西北三面是小丘，或聚或散，海拔 源~ 缘公尺，西南地势较平坦。长江以南至杭州湾的良渚文化，以吴与钱山漾为例，遗址四周许多小山环绕；丘城遗址则位于两个相连的小山上，紧临太湖。淮南青莲岗正冲着洪汛区，遗址在一条岗脉上。至于江南已知最早的新石器文化——河姆渡文化，上述的地理特征已经很显明了。河姆渡遗址位于杭州湾南岸、四明山和慈溪苑

南部山地之间的一条狭长河谷山原上，西、南两面濒临姚江，过江是四明山麓，东、北两面一片平原，地质钻探，这片平原的耕土层以下有厚度不一的泥灰层，是湖泊沼泽水退淤积造成的。穿过平原则为慈溪南部山地。这些迹象表明，当时河姆渡周围的地形应是平原、湖沼和丘陵山地的交接地带。

总之，气候虽殊，地理虽异，古代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的农庄聚落都有一个共同现象，即在近水的高地：水，或支流或湖泊，地，或台地或丘陵。我们的祖先在这种环境过日子，故称为“丘民”，孟子乃说：“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墨子也说：“古之民就陵阜而居。”春秋时代依然有很多地方名为某丘，或某阜的。还有一种大丘，古书称为“虚”，譬如鲁是少昊之虚，卫是颛顼之虚，陈是太昊之虚，邻是祝融之虚，齐是爽鸠氏之虚，皆三代以前大部族所居的丘陵。古人山居，文献传说和考古发掘是可以通释无疑的。

愿